

跨文化的研究
外语教学

INTERKULTURELLE DEUTSCHSTUDIEN

主编 梁 镛

副主编 刘德章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

主 编 梁 镛

副主编 刘德章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 梁镛主编.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ISBN 7-81046-680-1

I. 跨… II. 梁… III. ①外语-研究②外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093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责任编辑: **江燮松**

印 刷: 上海市崇明县晨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72 千字
版 次: 1999年 10 月第 1 版 1999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46-680-1/H·622

定 价: 15.8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跨文化日耳曼学的发展史和体系

——关于“什么是跨文化日耳曼学？”问题的几个答复

●阿洛伊斯·维尔拉赫(Alois Wierlacher)

按照认识论历来遵循的准则,跨文化日耳曼学(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的理论建构始于对专业领域的区分。首先,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学委员会1970年提出的建议的启发,把日耳曼学分成基础语文学(其中包括:母语日耳曼学,德国国内日耳曼学,地区日耳曼学)和外语语文学(包括:国外日耳曼学,外国日耳曼学)以及注疏学方面的例外情况如瑞士。关于瑞士日耳曼学的特点,Michael Böhler曾分别于1985年、1987年和1992年作了论述。在区分理解上提到的不同概念时,首先要了解对外德语在国外的特性。^①

以上是“跨文化日耳曼学”理论建构的出发点。国际跨文化日耳曼学协会(GIG)^②从一开始就把母语日耳曼学、对外德语和国外日耳曼学的三位一体视为学术研究的基础。阿尔堡、拜罗伊特、杜塞多夫和卡尔斯鲁厄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略有不同。^③

① 见 Wierlacher 1972, 1973 和 1975 以及 Weinrich 1979 的论述。

② 以下简称“协会”。译者注。

③ 参见协会论文集第三册和 1989 年对外德语年刊(Jahrbuch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第十五期。

二

当今,对德语的科学研究已遍及全世界,但是世界各国看待德语和德语国家的眼光不尽相同。^① 因视角不同,看到的内容也就不一样。承认和尊重学术研究中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不同视角和重点,并且在跨文化的对话中让对文化特征的各种看法畅所欲言,这是跨文化日耳曼学的宗旨。在德国国内的母语日耳曼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上述宗旨至今未受到重视。在联邦科学委员会于1970年提出把日耳曼学区分成基础语文学和外语语文学的建议之后,对外德语这门年轻专业的发起人以及一些与他们有交往的母语日耳曼学学者发起创建了新的专业,创刊了《对外德语年刊》,并于1980年出版了第一部系统阐述德语作为外国语的论文集。^② 1974年至1984年之间,在德国科学研究联合会(DFG)^③的支持下,我主办了一系列“对外德语夏季国际会议”,来自母语日耳曼学和外语日耳曼学这两个领域的德语文学专家、语言学家和教学法专家会聚一堂,探讨大家共同感兴趣的专业问题以及这两个专业领域的不同点和侧重面。根据同行们,特别是国外同行们的愿望,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终于在第四届夏季国际会议召开之际,于1984年7月13日成立了“国际跨文化日耳曼学协会”。Ivar Sagmo 和 Bernd Thum 两位同仁在《对外德语年刊》第十一期(1985)里对协会的成立过程作了详细报道,其中,关于协会纲领部分,文章中写道:

① 参见 Ihekweau, Sadji 和 Tsuji 等人的文章。

② 见 Wierlacher 1980。

③ DFG 是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的简称。

回顾一下不同文化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文化在向另一个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同它划清界线。外来文化成了本国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如果日耳曼学能够注意到自己学科的条件、课题和认识过程中包含的文化多样性,那么它也同样能够充分利用外来文化和本国文化之间存在的那种建设性的相互关系。跨文化日耳曼学力促对文化多样性解释功能的意识,以此来克服那种由己方文化中心论造成的学术上的孤立。跨文化日耳曼学注重对文化间差别的尊重,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本国的文化和外国的文化。

一年之后,国际日耳曼语言文学联合会主席 Albrecht Schöne 进一步明确强调了这一“纲领”的性质:^①

与自然科学专业的国际化性质不同,日耳曼学的特点是,它不仅在不同国家被研究,而且还在不同国家用不同的方式被研究。即使我们对理论前提、方法论原则和科研过程的规律有着共同的想法,由于受不同的条件、经验和兴趣的影响,各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看法的差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甚至研究对象的选择、比较材料、课题和衡量标准的设定、主要参考文献的筛选以及作品的接受过程显然均受到不同的出发点和基本看法、不同的需求、任务和不同的母语,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以及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为了能够在“相互交流”中互相学习,我们必须充分发掘这种视角多样性所带来的动力,而不应该让那种毫无意义的大一统的做法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从一位德国日耳曼学家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如果他不是把在非德语国家大学的德语、德国文学和德国

^① 见 Albrecht Schöne 1986,9.

国情专业理解成文化传播点或民间领事馆的话,那么他即使从本国文化的利益出发,也不应该希望人们在那儿只是在用小火去温热那些我们在家已经煮熟的、或多或少还能食用的冷饭。

上面引用的两段原则性论述同样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两段引文用“相互关系”和“相互交流”这两个概念在“外来文化”和“己方文化”的地平线上将学术活动中的“国际性”(Internationalität)和“跨文化性”(Interkulturalität)范畴连接在一起。其中,“inter”^①不再具有那种落入俗套的含义,而重又找回了该语词原本就有的“之间”(zwischen)和“相互间”(Wechselseitigkeit)以及“彼此”(miteinander)的涵义。以上两段论述扩大了日耳曼学对自身的理解,跨文化日耳曼学不仅仅包括语言和文学,她是一门文化科学。这一理解的目的在于,通过使该专业更趋完善以适应文化多样性对本专业提出的多样性要求。同时,以上论述又认为,不同的文化地区完全可能产生独特的理论。在此意义上,跨文化日耳曼学不仅仅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也不仅仅是对外德语的教学法研究,而是一门面向现实、以语文学为主导,同时带有比较文化人类学特性的文化科学。^②以上两种论述并不是要并吞或孤立某个专业,而是要做到兼收并蓄,尽管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发展尚不平衡。

① inter 在德语中的原意为“间”或“之间”,本文中固定译成“跨”。译者注。

② 这一专业设想我在1980年论及日耳曼学中外国语言文学的基本特征时就已特别强调过。参见 Wierlacher 1980 导论部分,注释三。

三

国际跨文化日耳曼学协会的成立是国内外众多学者长期以来共同建设和考查的结果。如今协会共有两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协会所在地为卡尔斯鲁厄,秘书处自 1994 年初起迁至拜罗伊特。协会理事会成员按章程规定为五人,其中最多允许有两位是在联邦德国境内工作的。首届董事会成员为 Klaus Bohnen 教授(阿尔堡),Walter Hinderer 教授(普林斯敦),Kenichi Mishima 教授(东京),Bernd Thum 教授(卡尔斯鲁厄)和 Alois Wierlacher 教授(拜罗伊特)。

协会是一个公益性组织,它通过协会成员的推荐来接纳新会员。协会和日本德语协会等许多其他学术组织有合作关系。协会不是一个一般的团体,而是一个研究性的组织,它的成员是日耳曼学专家、德语教师和在其他专业和职业领域里从事德语国家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的代表。他们的合作旨在把科研和教学工作与跨专业的文化交流工作结合起来,借助因文化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来扩大认识问题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跨文化日耳曼学是应用型文化科学的一部分。^①

四

协会的第一任主席由我担任。原因是,由我代表的对外德语专业在建立和发展跨文化日耳曼学的工作中起了特别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把大学的对外德语专业看成是纯粹的外语教学法专业,而是理解成一个面向学习实践、面向外国语文文化和人类文化学

^① 参见 Bernd Thum 1987 和 Klaus Bohnen 1987 的文章。

的日耳曼学专业,那么,以对外德语专业为基础发展跨文化日耳曼学专业的有利因素就是显而易见的了。由于任何一门文化科学都容易出现专业科目泛滥的倾向,所以本专业不求包罗万象,但注意重点突出以及各专业科目之间的视野分布。根据这一设想,我们在拜罗伊特大学把本专业分成五个组成部分,它们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研究)、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德国国情学、异域文化学和比较文化学。这五个部分的选择和排列不是随意的。^①

本专业的学术定位处于基础语文学(母语日耳曼学,德国国内日耳曼学,地区日耳曼学)和外语语文学(国外日耳曼学,外国日耳曼学)之间,这一学术定位并不容易,但同时又使我们的专业建设得益匪浅。本专业同时兼顾以上两大领域:与母语日耳曼学的共同点是,除了以德语为母语的大学生外,我们拥有以德语为母语的师资,有德语文化区域和该文化区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外语日耳曼学的连接点是 Albrecht Schöne 前面阐明的三大要点,再加上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我们在教学和科研方法上重视以异域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德国语言文化等等。因此,本专业同时又是处于多种文化之间,并致力于文化间的沟通和理解。本专业是一门名副其实的跨文化学科。

1994年7月19日至23日,协会在杜塞尔多夫大学召开了第三届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视角——国际化时代中跨文化日耳曼学的建构和设想。该主题分成七个部分,其中五个既为拜罗伊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学专业的组成部分,再加上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新闻媒介专题以及在外语日耳曼学中不可轻视的、但在德国由于实际原因无法实施的翻译工作。对于后者,除了格廷根大学的同行外,还有成立不久的格尔默尔斯海姆大学的

① 参见本文附件“拜罗依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学专业设置”,译者注。

跨文化日耳曼学专业也将重点从事翻译工作的教学和研究。上述七个部分从原则上讲勾勒出了跨文化日耳曼学的发展前景,描绘了该专业的主要工作领域,同时又阐明了各分支之间的分工和界别。

五

如何促进各文化间的相互交流,这是跨文化日耳曼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同时也已经引起外语日耳曼学和基础日耳曼学部分学者的关注,提出应将此作为这两个学术领域科研工作的指导性原则。^① 协会的发起人清楚地知道,传统的日耳曼学若对促进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感兴趣,其前提条件是放弃德国日耳曼学惯用的标准和要求。迄今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这一观点。1976年,Jeffrey Sammons 曾断然拒绝把美国的日耳曼学理解成“日耳曼学在外国的附属机构”。他指出:“我们须完成的任务不同,我们的处境也完全不同。”1980年,Theodore Ziolkowski 以类似的尖锐语气批评了德国的日耳曼学对外国德语学习研究的控制倾向。匈牙利日耳曼学家、前国际日耳曼学协会副主席 Antal Mádl 在198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其实早在1975年,Pierre Bertaux 在《对外德语年刊》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中就对母语日耳曼学和外语日耳曼学工作内容的差别作了分析,他写道:

德语“日耳曼学”(Germanistik)这一概念译成法语时通常采用“德国语言特点”(germansisme)一词。然而问题是,两者的实际所指是否一致,是否可能一致。[...]究竟是“日耳曼学”还是“德国语言特点”的问题不仅仅是用词上的论争,也不

① 参见 Nobert Mecklenburg 的文章。

仅仅是翻译的问题,这两个语词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相互竞争和相互背离的见解,这些见解有时甚至会发展成公开的正面冲突。[...]要学习日耳曼学这个专业,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首先是要或多或少地掌握好德语的知识,同时必须掌握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文化。[...]因此,传统日耳曼学的任务是,对已有的文化在其基本特征的各个方面加以完善、澄清和作进一步的发展。为此,研习传统和那些“伟大”作家的经典著作是一项极其有益的练习。但法国日耳曼学家现在所教授的学生,他们对德语和德国社会现状大多还知之不多,甚至带有不少错误的想象。对这些学生来说,他们学习的内容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存在着教学法方面、同时也是教学内容方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就很容易理解那个事关重大的误解,这个误解就是死板地抄袭在德国国内完全适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把它们套用于法国的大学制度;要求在法国执行由德国文化部长联席会议提出的三位一体的模式,即德语语言、德国古典文学和德国现代文学这三门专业,^①也就是说,要在法国搞一种德国模式的日耳曼学。

六

关于“什么是跨文化日耳曼学”问题的第二个答复涉及设置本专业的合理性:如果说世界各国日耳曼学的组织和教学不应照搬“母语专业”的模式,那么,不正是应该在促进文化间交流的基础上来发展各具特色的日耳曼学专业吗?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思想、经济、政治、艺术、科学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国际化的时代,这个国际化的时代要求我们具有全球意识,如果我们想要更多地参

^① 参见1970年5月21日发布的德国文化部长联席会议的决定。

与发展 and 改造我们的世界,而不将此仅仅看成是政治家和企业家的任务的话。我觉得,Robert Picht 对于语文学家未能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指责是很有道理的。改变这种局面的理想之路是对本国和外国有关专业之间的相互生存关系作一番认真的思考。因此,跨文化日耳曼学的实际理论建构一方面是把语文学扩展成区域性的和比较型的文化科学,另一方面是开展一场关于己方和外方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这一专业讨论至今未在德国获得合法权。

关于“文化”、“文化科学”和“异域文化”这三个核心概念以及研究这三个问题的方法问题,Hermann Bausinger(1980)、Dietrich Krusche(1980)、Norbert Mecklenburg(1987)、Bernd Thum(1987)、Harald Weinrich(1985)和 Horst Turk(1993)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先后发表在《对外德语年刊》中的有关论文于1990年由慕尼黑的 iudicium 出版社结集出版。同年,在大众汽车基金会的赞助下,“国际交际和对外文化学院”(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Kommunikation und auswärtige Kulturarbeit)在拜罗伊特成立。在成立大会上,Kenichi Mishima 作了题为“国际化时代的异域哲学”的报告。

七

对本文提出的问题的第三个综合性的答复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从科技角度来看越来越小且日趋统一,同时世界各国对维护文化的独立性和多样性的愿望则越来越强烈。作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我们不仅需要强调本国文化和本国语言、以本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导向的诸如德国式的、美国式的或印度式的日耳曼学,而且也需要一个以跨文化为导向的日耳曼学,以便能够开展文化间的对话。对于在对外德语专业中建立起这样一个

跨文化的日耳曼学的方法和有关研究课题,我在 1987 年曾作过专门的阐述。我认为,要具备开展文化间对话能力的两个最重要前提是:

- 在承认泛文化共性的同时,正视世界各国在阐释日耳曼学时展示的多样性和不同点;
- 不仅要看到,不同的文化由于不同的出发点和视角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会形成各自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为我们认识问题提供了机遇,而且我们应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地利用这一机遇。

发展跨文化日耳曼学的重要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 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把德语语言学和篇章学扩展成为区域性和比较型的异域文化科学。
- 学科的建构应有利于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说,应成为一门有助于自身反省同时又反映实际异域文化问题的学科。
- 我们的学术工作应对从事国际合作工作的人才进行跨文化的教育,这一育人概念应成为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导向。
- 建立相互间的理解以促进跨越语言和文化界别的共同行为能力,马克斯·韦伯曾把“共同行为”称为社会学研究理解问题中的最基本的范畴。
- 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发展、使用和提倡一种新的科学用语,这种科学用语尊重科研活动中具有文化特性的条件和形式,消除母语日耳曼学的一统地位,同时减少母语德语和外语德语使用者之间的不平等现象。
- 如同 Götz Großklaus 和 Bernd Thum 1989 年所指出的那样:“应该了解自己的科研课题、兴趣和方法中体现出来的文化特性并使之明了化,也就是说,将自己的科研活动与本国的科学历史传统以及文化意识和文化话语联系起来,这一联系涉及历史、现实和未来。明确学术活动中的历史文化特征当然并不表示不加批评地肯定一切”。

- 就像卡尔斯鲁厄的同行们明确指出的那样,“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开展研究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化视角和工作方式,每个日耳曼学学者在他的工作中实际上只具备这些不同的文化视角和工作方法中的一部分。因此,他应该正视其他国家日耳曼学学者的兴趣和科研目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兴趣和目的往往是同各自的文化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即在研究德语国家文化的过程中力图明确自身文化在众多文化中的地位”。
- 如上面提及的那样,我们应该与德国的传统日耳曼学的标准和要求告别,并加强对我们在国际交流中所持态度的自我批评。
- 应该就我们对异国文化的评价以及异国文化对德语和德语国家的兴趣展开讨论。所谓他方文化的“异域性”实际上是对他方文化有别于己方文化的一种诠释,^①因此是一个关系双方的范畴。我们在探讨变体和替代形式问题时,势必应该检验一下我们观察外来事物和异域文化的视角。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他人的眼光来观察一下我们自身的文化,并在注疏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跨文化的立场。^②这种“观察方式”总是以批评的理解能力为前提的。

八

怎样实现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怎样通过这种交流来建构跨文化日耳曼学,我们可以用 Max Horkheimer 在 1952 年大学开学典礼上的一番讲话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宇宙,它不是万能的,而是处处充满着矛盾。想通过一种万能的精

① 参见 Weinrich 1985, Mecklenburg 1991 和 Turk 1993 的有关论述。

② 参见 Scheiffele 和 Matthes 的有关论述。

神架构来召唤这个世界是不现实的。”

应该明确地指出,跨文化日耳曼学的目的并不是在交际中包罗他人和异域文化的一切,而是与此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促成自由和独立的前提。对于这一原则问题,我下面还会谈到。对我们来说,理解是一个相互接近的过程。交际的内容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按照不同的理解范畴,篇章的语言自有不同的功能。^①因此,用他人的眼光来观察问题也只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一致目标是开展相互间的对话,即使各方交际历史的内容和发展水平互有差别。要求开展对话并不排除利害冲突。

面对世界范围内在发展水平和力量对比方面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的现象,如果有人觉得以上观点过于追求和谐,如果有人想要争取更多的对立范畴,比如建构二元化的“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学和语言学研究,那么他应该听一听南北委员会主席的忠告:

八十年代的沉痛教训是:谁错过了实事方面的合作机遇,谁让世界范围内本可避免的冲突——东西冲突,南北冲突——肆意扩展,那么他就是一个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的人。

九

在对本文讨论的问题作出的最后两个答复中,跨文化日耳曼学的理论再次涉及时事论争的核心所在。

一、我们认为,认识到己方文化和异域文化之间相互关联的生存关系是参与文化交流和培养国际合作能力的前提。我们的自由也是他人的自由。在此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跨文化日耳曼学的特

^① 参见 Steinmetz 1987。

点同样在于把理论和实践上的自由看作是学术研究的重点,^① 并完全赞同实际的自由化政策,因为这有助于世界范围内德语研究的多样化发展。这并不是—种时髦和新鲜的立场:“人文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面对着一项双重的任务,—方面给予人类的历史生存以意义,另—方面是揭示自由活动的空间。”^②

与以上提及的第一项任务相比,第二项任务看来是无可争议的,但同时又是被大大忽视了的任务。谁要想尊重他方的文化,那么他就必须为促成自由而努力。自由是人类宽容能力的基本条件,对于这一点,Alexander Mitscherlich 在 1970 年发表的“宽容——概念的考察”一文里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们在探讨异域文化以及他们对德国和德国文化的兴趣时需要—种多元文化的概念。正因为宽容是建立多元文化的—个不折不扣的条件,所以我认为,参与建设—个跨专业的宽容学研究是跨文化日耳曼学的基本任务之—。^③

二、在观察异域文化的时候,我们的视角往往经过了自身文化固有理解框架的过滤,而常常因此忽视了我们的行为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然而,各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远远没有跟上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的步伐以及由此带来的危险。面对欧洲目前的形势,有人甚至提出了造成欧洲各国之间隔阂的“文化墙”概念。如果我们想要拆掉这堵文化墙,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合作能力的培养。

培养国际合作能力的—项必要条件是,具备“着眼于全球的思维和落实于局部的行为”的能力。就此而言,跨文化日耳曼学从它的学术伦理角度来看又—门“育人的专业”,它着重于探讨旨在

① 见 Wierlacher 1989。

② 参见 Arnold Rothel 1988。

③ 参见 Wierlacher 1992。

改善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跨文化交流的学术手段,它正视世界政治中那些有利于改善对异文化理解的紧迫问题。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存有赖于对异域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我们认为,跨文化的教育是时代的要求。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知道,顾及邻国和异域文化生活习惯的特殊性,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维护我们自身文化自由的先决条件。因此,不仅要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应该懂得尊重他人的自由。在科研和教学计划的总体分工标准问题上,尤其在文学和国情学的统筹安排方面,跨文化日耳曼学把认识世界看作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的目的始终在于,怎样去认识各文化间的界线以及怎样使这方面的认识发挥积极的作用,以便一起深入钻研共同关心的问题。^①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无疑有必要对“育人”这个概念作出新的定义。育人过程中的能力培养,不仅要做到掌握和了解己方的文化,同时也要做到超越自身文化的界线,^② 将“国际化”这个概念从其浅俗的含义中解脱出来。国际化(Internationalisierung)常常被理解为一种“跨国界”和“超国界”的范畴,我们则不用“inter”这一语汇来描述一种居于各种文化之上的范畴,这样的理解实质上是在为用西方科学的共用语言来解释其他文化鸣锣开道。采用“世界音乐”或“通用戏剧语言”这样的概念蕴含着抹杀文化特性的危险,这与我们的观点是迥然不同的。

我们重视“inter”一词原本所包含的“之间”和“相互”这两层涵义,把跨文化的育人理解成是一个克服以己方文化为中心的思潮的过程,其途径是通过各文化之间的相互“衬托”,^③ 建立起一座

① 参见 Mishima 1987 的有关论述。

② 参见 Edward Hall 的论述。

③ 参见 Scheffele 的论述。